

唐宋回鹘史论集

程 溯 洛



人 民 出 版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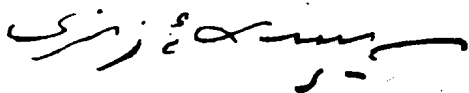
代 序

程溯洛同志于解放前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从事宋、辽、金史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他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与著名民族史专家冯家昇同志一起从事维吾尔族历史的研究。当时我国维吾尔族史的研究尚属初创阶段，最迫切的任务，是搜集和整理各种文字的维吾尔族史料。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和冯家昇等同志合作，搜集了大量有关的维吾尔文、突厥文、回鹘文、汉文和外文的维吾尔族史料，并于1958年编写出版了《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下册。这部书堪称是我国维吾尔族史研究的一部开山之作，在国内外的史学界都有不小的影响，而且至今仍被公认为研究维吾尔族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1978年以后，程溯洛同志受国家民委五套丛书办公室的委托，负责主编《维吾尔族简史》的古代部分。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该书已于1991年出版。虽然书中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之处，但却是建国以来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维吾尔族通史。我和程溯洛同志虽未曾谋面，但读了这部《简史》以后，感到这部书的古代部分，材料十分丰富，说明作者史学功底深厚，并且确实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程溯洛同志在写这部《简史》之前，曾撰写过30多篇有关维吾尔族史的论文，大部分曾在各种期刊上发表过。另外，近年来，他又新撰写了一些论文，并翻译了帝俄时代的语言学家拉得洛夫著的《回鹘文文献纪念集》中宋元时期的回鹘文契约文书——是一部分很珍贵的材料。所有这些，是程溯洛同志40余年来从事维吾尔族

史研究取得的丰硕成果。现在，他将这些论文重新整理成集，奉献给读者，以利后学的进一步研究。我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工作，故愿意促成它的出版。



赛福鼎·艾则孜

1992.2.4于北京

目 录

代 序	(1)
中外有关维吾尔族史的研究	(1)
维吾尔族族源考	(25)
维吾尔族居住新疆考	(39)
回纥在漠北兴起之初的社会性质	(51)
——从原始氏族社会飞跃到初期封建社会	
回纥游牧封建汗国的兴衰(744—840)	(62)
回纥汗国建立前后与唐朝的关系不同	(82)
释汉文《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中有关回鹘和 唐朝的关系	(102)
跋刘美崧《两唐书回纥传回鹘传疏证》	(115)
《宋史·回鹘传》补正	(117)
甘州回鹘可汗谱系考	(140)
甘州回鹘始末与撒里畏兀儿的迁徙及其下 落	(150)
宋元时期高昌回鹘王国初期农业封建社会 的若干特征	(166)
《宋史·高昌传》笺证	(175)
高昌回鹘王国亦都护谱系考	(205)
——西域时代回鹘史札记	
《宋史·龟兹传》补正	(223)

2147/06

——兼论高昌回鹘王国中的双王制

高昌回鹘王国	(236)
高昌回鹘王国史中若干基本问题论证	(261)
高昌回鹘王国政治经济文化史略	(285)
吐鲁番棉花的生产是中国植棉史中一 颗明珠	(300)
《宋史·于阆传》中几个问题补证	(306)
喀喇汗王朝的文化和风习	(338)
五代宋辽金时期新疆回鹘人民和祖国各地的经 济联系	(347)
论回鹘与五代宋辽金的关系	(360)
九世纪中叶回鹘民族东西两部的汇合与对 塔里木盆地古代文化的继承	(401)
论敦煌、吐鲁番发现的蒙元时代古维文木刻 活字和雕版印刷品与我国印刷术西传的 关系	(411)
突厥、回鹘等古代我国北方各族人民发式考略	(418)
附录 汉译(俄)拉得洛夫《回鹘文文献纪念集》 中回鹘文契约文书56篇	(431)
后 记	(474)
附 记	(476)

中外有关维吾尔族史的研究

维吾尔族是我们伟大祖国中一个优秀的民族，它的人口众多（据1990年统计，聚居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共将近721.5万人），历史悠久（它的族源可以推到公元前三世纪末的丁零）。维吾尔族从较古的时代（公元后四至八世纪称铁勒，又名“九姓乌古斯”）起，除一部分人住在蒙古草原外，还有不少人早就住在“丝绸之路”的要冲西域。这里地大物博，在海道未通以前，一向为欧亚陆路交通的必由之径，因之外国人来此旅游和记载维吾尔人的著作，早从公元九世纪中就开始。特别从近代十七世纪以来，因资本主义的发展，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东方学”、“突厥学”兴起，不少西方的学者为其资本主义国家向东方、向中国扩张的政治目的服务，先后来我国新疆、蒙古，从事“探险”或旅游，搜集到不少有关回鹘文的文书或宗教经典，或临摹库车、吐鲁番一带石窟中的宗教壁画，公开出版，惊震中外，遂使维吾尔族古代的历史，引起世界的注意。于是外国学术界研究维吾尔族历史的也大有人在，致使维吾尔族历史的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可是，维吾尔族在历史上没有建立过长期性的王朝，既没有纪传体的正史，也无编年体的通史。它本身史料的特点是少而零散，主要的有突厥文、回鹘文的碑铭和契约文书，其中不少内容是关于宗教的；其次是波斯文、阿拉伯文的资料，其中内容真正牵涉到回鹘的不太多。汉文中有关的史料固然是主要的，比较丰富，但除廿四史的《四裔传》以外，其他《实录》以及编年体通史中的材料也是分散的。这种

情况给维吾尔族历史的研究带来不少的困难。为了使有志于从事维吾尔族历史研究的年轻同志能找到一些线索,个人窃不自揣,将平日所收集到的有关维族史的书目或论文篇名,依次分类,略加介绍,有的则只是开列,以便检查,遂写成此篇。其中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只望它能作为一个初步的介绍,以饷读者,并望海内外学者专家不吝指正!

一、史料(包括碑铭及考古)

早在公元八世纪中,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趋于极盛及其东向中亚发展,到九世纪中即有阿拉伯人伊本·可尔达白(Ibn khordadbih)曾东来我国新疆旅游,写成《道路和邦国志》(Ku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一书,记载九姓回鹘(Tagozgoz)是游牧人,信仰摩尼教。十世纪中阿拉伯地理学家马素地(Masūdi)在其《黄金牧地》(Meadows of Gold)中说回鹘人人数量多、最勇敢,信仰摩尼教,王名伊利可汗(ILE Khan),人们尊称他为“阿斯兰汗”(意为狮子王)。十一世纪中来过中国的阿拉伯旅行家马尔瓦则(Marvazi)在他所写的《论中国、突厥人和印度》(Marvazi On China, The Turks and India)一书中,记载从喀什到甘州回鹘境内的路程。

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草原,进而击败黄河流域的金王朝后,即西向攻取中亚的西辽和花拉子模,铁骑直至欧洲东部和今伊朗北部。此后,欧亚陆路交通畅达无阻,波斯和元朝中国往来频繁,文化也得到进一步的交流。十三世纪中伊朗史家志费尼(Juūāini)曾来新疆及蒙古作多次旅行,记录了畏兀儿人关于其远祖的传说。他的名著《世界征服者史》(有汉译本)中即有畏兀儿的远祖卜古可汗(Buku Qhan)原住鄂尔浑河流域,信奉摩尼教,曾

远征中亚筑八拉沙衺城(唐名裴罗将军城)、他的后人来才转到西域天山北麓别失八里(唐名北庭)住下等记载。十四世纪中,波斯另一位史家拉施特·丁(Rashīd al-dīn)在其名著《史集》(Jāmial-Tawārikh, 有汉译本)中载有畏兀儿人祖先乌古斯可汗(Oguz Qhan)的传说:乌古斯可汗开始信仰伊斯兰教,和不信仰伊斯兰教的父亲黑可汗展开斗争。这个记载显然是将十世纪中天山南路回鹘民族中民间稗史性的著作关于其始祖乌古斯可汗的传说涂上伊斯兰教的色彩了。所以,拉施特·丁《史集》中的“乌古斯可汗”很可能指的就是从十世纪半到十三世纪初在中亚和新疆西部由回鹘人建立的喀喇汗王朝中信奉伊斯兰教的可汗。以上为从十三到十四世纪中波斯史家关于维吾尔族祖先传说的记载。

古代突厥文碑铭如八、九世纪中所立的《突厥毗伽可汗碑》《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又名《葛勒可汗碑》)以及《九姓回鹘毗伽可汗碑》(又名《保义可汗碑》)中都已出现“维吾尔”(汉译为“回纥”)的自称,而这三个碑及《阙特勤碑》、《噶欲谷碑》中更时常出现以“回纥”和“乌护”并举之处。

维族以本民族文字记载历史也很早。十世纪时,天山南路有一位无名氏的回鹘人用回鹘文写成一篇《乌古斯可汗传说》,其手抄稿的原件,有一大部分的残篇因辗转流传而被保存在法国巴黎查理·余非尔氏(Herr Charles Schéfer)的藏书库之中,后来到了十九世纪末被帝俄时代的突厥语学者拉得洛夫氏(W. Radloff)取到,用影印或老满文字母排印(因回鹘文字母没有刻印体),附在他的著作《八拉沙衺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的“福乐智慧”》(Das-kudatku-Bilik des Jusuf Chass-Hadschib aus Balasagun)一书的末尾。他在这本著作的《导言》中还用德文写出一篇《关于乌可斯可汗、维吾尔民间所传说的一个稗史性的断片》的介绍,其最后地点确在新疆南部,传说的定型及其写成文字的记载,其时

间大约不早于十世纪^①。

此外,十一世纪中有喀喇汗王朝境内回鹘人阿勒马伊(Husein al-Almai)写的《喀什噶尔史》,现已失传,只有一些片段保存在十四世纪中阿拉伯人杰马尔·卡尔希(Djamal al-Qarshi)用阿拉伯文写成的《苏拉辞典补编》(Mulhaqat al-Surah,前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手抄本,英译名为《Supplement to the dictionary Surah》)中。这些片段有关喀喇汗王朝早期的一些传说,不少内容是神话性质,在年代上也有错误^②。同世纪中,维族人写的两部名著《福乐智慧》(原书为Kudat-Ku Bilik)和《突厥语大辞典》(原书名为Divuan Luqhatit Türk),虽然属于文学、语言学的著作,可是其中包含宝贵的史料。前者反映了伊斯兰教教义与秦(中国)儒家道德观念的糅合;后者提供了我国新疆以及中亚地区的丰富史地知识。

十四世纪中,高昌回鹘王国末年在元朝甘肃省武威县北石碑沟所立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之碑》(下述)的前半段是根据原有的《高昌王世系》(已佚)而撰的。参考上引同世纪中波斯史家拉施特·丁的《史集》中说:“兹转录畏兀儿书籍中所载之若干事,录之者非信其说之真,特以广异闻而已”。又说:“顾畏兀史甚详,我将根据其载籍,在此史书补编中全录其事;此处略言其起源而已”。可见畏兀儿人古代的史书原来记事甚详,惜后来都已失传。所以拉施德·丁《史集》中的《乌古斯可汗传说》和后来十七世纪中中亚作家阿希尔格齐(AbouI-Gazi)所著的《突厥系谱》一书中所写的《乌古斯可汗的稗史》、《乌古可汗诞生的报告》等篇,都已涂上伊斯兰教的色彩,加以附会,不是维吾尔族自己原来的记

① 拙稿:《维吾尔族源考》,见本书。

② 参考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第1—2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载了。

明代，西域察合台后人历史家米儿咱·马黑麻·海答儿所著的《拉什德史》(The Hiatory of Rashid)记述元代西域察合台汗国统治天山南路时期(1347—1566)，“阿尔蒂沙尔”(意为南六城，即喀什、叶尔羌、莫吉沙、和田、乌什吐鲁番、阿克苏)伊斯兰教宗教领袖秃黑鲁帖木儿及其后世的事迹甚详，可补《明史·西域传》之不足。其书原用波斯文写，后经英国人伊利爱斯(N. Ellias)和罗斯(E. D. Ross)二氏译成英文，书名《中亚蒙古儿史》(A History of The Monghuls of Centrial Asia)，是世界名著(因为是蒙古察合台世系最后一代历史，弥足珍贵。近年已经新疆社科院民族所译成汉文)。

维族自己最大的史料而保存到今的有突厥文刻的《磨延啜可汗碑》。磨延啜，回纥的尊号为葛勒可汗，唐封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为回纥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政权(744年)后的第二代可汗(744—759)。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迹为助唐朝打败安禄山，收复长安、洛阳，娶唐朝宁国公主为可敦(皇后)，和唐朝友好。碑立于757年(唐肃宗至德二年)，到1909(清宣统元年)由芬兰人兰木史台特(G. J. Ramstedt)在原蒙古人民共和国希乃乌苏(Shine-Usu)地方发现。这个碑保留下来的字数较多(虽然残缺也很厉害)，对于研究回纥民族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游牧封建政权的历史和古代的维语有重大意义。该碑碑文最先由发现者本人研究、翻译，发表在《芬兰——乌戈尔学报》(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1913年第30期上，题作《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罗尼文碑铭》(Zwei Uigurische Runenin Sch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其中重要内容在记载磨延啜跟随他父亲骨力裴罗和突厥的乌苏施米可汗相斗争以及他本人讨伐外九部中的客部葛逻禄和拔悉蜜的事迹。前王静如教授译的《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

碑》^①，也即《磨延啜碑》，可以参考。

其次为《铁尔浑碑》。此碑是1966年(或1967年)蒙古考古学者道尔吉·苏荣在原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省铁尔浑河流域发现的。据前苏联突厥学家C.O.T克里亚什托尔内研究，此碑是回纥汗国二世可汗磨延啜的纪功碑，也是第二个《磨延啜可汗碑》，其立碑时间比上述第一个《磨延啜可汗碑》仅早数年。碑铭的作者是骨咄禄达干将军。碑铭的内容：(1)叙述葛勒可汗的事迹；(2)以葛勒可汗的名义描述回纥汗国初期的历史、地理以及对后突厥作战的情况；(3)其子对葛勒可汗立国业绩的赞颂。前苏联对此碑研究的突厥学家克里亚什托尔内的论文已发表在《苏联突厥学报》1971年第3期上^②，可参考。

其三为汉文、突厥文、粟特文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其全称原作《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蜜施合毗伽可汗圣文武碑》。爱(ai)登里(tangri)罗(dä)汨(gut)没蜜施(bulmyš)合(älp)毗伽(biegā)可汗(gahan)，译意为“天赐福神武智慧可汗”，他是回鹘民族在漠北建立游牧封建政权的第九世可汗(808—821)，唐朝封为保义可汗。他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是出兵新疆，和吐蕃贵族进行斗争，用兵力保卫天山南北交通要冲的北庭(今吉木萨尔县护堡子)和龟兹(今库车县)。该碑立于814年(唐元和九年)，到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始由芬兰人海开勒(H. Heikel)在蒙古旅行中于回纥汗国首府哈喇巴喇哈逊(黑虎城)附近柴达木河畔发现，刊印在他编纂的《一八九〇年芬兰考古队所集鄂尔浑河碑文》(Insriptions de l'orkhon necucillies par l' expedition finoc's'e 1890, et publiques par La socie 'Ie' Finno-Ougrienne, Helsingfors. 1892年)中。原碑分别用突厥文、粟特文、汉文三种文字铭刻。因年

① 载《辅仁学志》，第7卷，第1、2期合刊。

② 见《民族译丛》，1981年第5期。

代久远，其中突厥文部分损害最厉害，仅保存三角形似的一小块；粟特文部分次之；只有汉文部分保存的比较完整些，其中特别记述牟羽可汗从唐朝内地传播摩尼教于回鹘地区以及保义可汗出师天山，保卫北庭、龟兹，维护祖国统一的事迹，可以补新、旧《唐书》之不足，所以他对研究回鹘民族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四为由汉文、回鹘文铭刻的《高昌王世勋之碑》，该碑是元顺帝元统二年（1334）时，元朝为高昌回鹘王国末年畏兀儿王帖木儿补化的家世树碑立传而立的。原碑立在元甘肃省永昌堡（在今甘肃省武威县北30里石碑沟），正面汉文部分收在元人虞集的《道园学古录》中，以后史书如《元史·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传》等都据此写传。碑的背面为回鹘文，原由黄文弼先生在1943年拓于甘肃武威县文教馆，采集保存，后由耿世民教授加以译释，刊在《考古学报》1980年4期中。

此外，维族人自己写的史料，还有《新发现的牟羽可汗入教记残卷》，收在德人班格（W. Bang）和女学者冯加班（A. von Gabain）合著的《突厥文吐鲁番卷子第二》（*Türkische Turfan-Teete II*）页7—9中，有回鹘文和阿拉伯文两种抄本的《乌古斯可汗史诗》（即《乌古斯可汗传说》），有帝俄时代拉得洛夫（W. Radloff）和原苏联的谢尔巴克（A. M. Щербак）的两种译本。回鹘文古代文献收集最多的是帝俄时代语言学家拉德洛夫的《回鹘文文献集》或作《回鹘文文献纪念集》、《回鹘文献纪念集》（*Uigurische Sprachdenkmäler*）和原苏联马洛夫（С. Е. Малов）的《古代突厥文献》（*Памятник Древне тюр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这两本书中。前一本书中多录法律文书、佛教片段、摩尼教和基督教内容片段；后一本书多录有关租借土地、赊借棉花、布匹、植物油、出卖奴婢的契约文书，以及摩尼教徒的祈祷文、基督教的《星相家的礼拜文》，以及佛教的《金光明经》片段。

明代的《高昌馆来文》(东洋文库本)——《高昌馆课》(胡振华、黄润华两同志用拉丁字母转字出版)中所保存下来的明代新疆地方政权送给明朝廷的文书也是回鹘文的。

维族古代回鹘文的碑铭,还有《乌兰浩木碑》、《布哈里葛亦都克造寺碑》、《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这四种,因研究者不多,恕不一一介绍。

近代维族学人也有不少历史著作。如解放初期乌鲁木齐市地志博物馆(后归并到自治区博物馆中)中藏有喀喇汗王朝第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可汗《沙免克·布格拉汗史》,叙述十九世纪伊犁维族人民起义的《阿凡提待尔木卢克》以及阿古柏祸乱新疆的好几种书,这些都值得参考。又如原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藏有中国维族史家所写的有关维族近代史六种:第一种是和田人慕哈米得·阿米拉(Мухаммед Амила)所写的《喀什噶尔史》,第二种是无名氏手写的有关阿古柏事件,第三种是马木德伯克(Мамуд Бека)写的《阿古柏汗阿大力和加史》,第四种是毛拉木萨(Мулла Муса)写的《额敏史》(Та-рих И Эминя),第五种是和加·玉素甫(Хаджа Юсуфа)写的史丛《阿加姆·阿特克他屋瑞黑》(Ажам Аттаварих)^①。如果科学地检查,我们就可发现,这些史料和著述的大多数充满了宗教的神话和传说,有的且牵强附会,不但无助于史学,反而混乱了历史的真实性。兹举一例,维吾尔穆斯林上层人物中有所谓“和加”的,其意为“圣裔”,即自命为穆罕默德的后裔。他们所写的系谱,自称为“圣裔的若干代”,他们的“麻札”(坟墓)在喀什、英吉沙何处、何处,好象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如果他们所写是真实的,那他们简直是阿拉伯人的后代,而不是突厥语族的维吾尔人了。可见,这种宗教的附会显然不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研究时,必须加以鉴别。

^① (俄)吉洪诺夫:《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维吾尔人的历史手稿》,载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集刊,1954年第19期,第164—174页。

1956年10月至1957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曾经派出一个民族调查组到乌鲁木齐市和田地区所收集到的档案文书,计有用维文写的档案,包括契约、宗教判词、布告等凡507种,光是乌鲁木齐一地所存的档案即有1400捆、和加系谱表3分、照片492张、书818册。在收集到的报刊中,即有《反帝战线》、《新疆日报》,是内地所不能得到的。收集到的书中,有用维文写的《维族史略》、《布格拉汗史》、《和加传》等,很有价值。至于1960年“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新疆收集到的用老维文写的资料那就更多了,现存在北京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将来要整理出来,归入由国家民委领导编写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民族调查资料》之中。

195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南疆若羌县米兰古堡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唐代回鹘人坎曼尔用汉文写的《忆学字》三首诗和抄写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长诗《卖炭翁》这两张诗篇,郭沫若先生已印在他的专集中。过去几年,中外专家曾有人指出这张原物粗纸的背面写有年代已久的察合台文,可见是元、明以后的伪造品。今个人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镰同志几次到乌鲁木齐市新疆博物馆实地调查的记载,才深信轰动一时的《坎曼尔诗签》是伪品^①,始作俑者是L(很可能指李征,今已作古)。新疆地区特别是南疆沙迹地带,用纸书写作伪更易,我们要特别注意!

1972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179号古墓的发掘中,还发现有回鹘人名叫和闐梨的汉字仿书,在同地伯孜里克石窟9号洞窟中还发现在唐代佛像供养人旁有回鹘文和汉文并行的题词^②。我国佛教石窟考古专家阎文儒教授在解放之初曾到南疆库车、吐鲁番

^① 见1991年《文学评论》第3期。

^② 转引自穆拜英《新疆出土文物中关于我国兄弟民族的历史文化》,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7年。

一带考查石窟多次，他在《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①一文中曾记下库车克孜尔石窟 47 号中《回鹘供养人》的壁画以及吐鲁番伯孜里克石窟 34 号中有五代北宋时期《供养菩萨》的壁画。

汉文纪传体的正史与编年体的断代史料不但是中国各族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化宝库，其中有关回鹘民族史的资料也是不容忽视的。如唐以前，关于丁零、铁勒，见于《史记》、《汉书》、三国的《魏志》、《晋书》、《魏书》、《北史》、《隋书》；从唐代起，回纥有传，始见于《旧唐书》；以后《新唐书》、《唐会要》、新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在有关的列传或章书中都有所记载。此外，《册府元龟》、《全唐文》、《通鉴》、《宋会要辑稿》、《蒙兀儿史记》、《明实录》中的资料也不少。至于王延德《使高昌记》、叶隆礼《契丹国志》、洪皓《松漠纪闻》、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陈诚《使西域记》、马文升《复兴哈密记》、许进《平番始末》等书，在适当时自有可取材之处。清代，特别从乾隆以后，更有大量专记“回部”（大多指维族）和新疆地区的历史，如三大《方略》即《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张格尔方略》和《平定阿古柏方略》、《清实录》、《东华录》、《西域图志》、《西域闻见录》、《回疆志》、《回疆通志》、《新疆识略》、《西陲要略》、《藩部要略》、《西域水道记》、《三州辑要》、《西城南八城纪要》、《新疆图志》等。这些史书的大多数，其中牵涉到少数民族的目的，毋庸讳言，大多数在于如何统治少数民族，所以侮蔑性的用词充满篇章，我们今日使用时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随着蒙古成吉思汗将欧亚陆路交通打开以后，在十三世纪五十年代中，即有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派遣耶稣教士卢伯鲁克（William of Rubruck）东来蒙古和林，谒见元宪宗蒙哥大汗，途经新

^① 见《文物》1962年 第7、8期合刊。

疆,在其所著《东部旅行记》(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1253—1255)中,记载在乌鲁木齐、吐鲁番以及伊犁河北岸的畏兀儿人中,他亲眼看见他们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还信奉景教。

十六世纪中,意大利基督教传教士利玛窦(Matho Ricci)著有《鄂本笃访契丹记》,介绍他的教会会士葡萄牙人鄂本笃来过中国新疆,记载当时叶尔羌汗国的商业、交通以及宗教信仰等情况。

十九世纪末,更有不少外国的旅行家、探险家记载新疆地区的史事,其中有涉及维族的,如英人包尔杰(Boulger)的《阿古柏伯克传》、斯克兰尼(F.H.Skrine)和罗斯(E.D.Ross)合著的《亚洲之心》(The Heart of Asia)、顿摩尔(Dunmore)的《帕米尔》(The Pamirs),俄人克鲁帕特金(A.N.Кропаткин)的《喀什噶利亚》(已有凌颂纯、王嘉琳据英译本汉译),美国林乐知用汉文写的《喀什噶尔略论》(在《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中)等。

二、论 文

欧洲人注意我国新疆,写有关回鹘考古历史的论著,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德国“普鲁士东突厥斯坦发掘团”的领导人格林维兑(Grünwedel)同勒叩克(Le Coq)在吐鲁番高昌回鹘王国遗址和库车克孜尔石窟中所发现的有关回鹘王国的佛教或摩尼教的壁画以及史书等,其考古报告多载于《柏林普鲁士科学院丛书》以及《柏林普鲁士科学会议纪录》中。1973年,经德国女学者冯加班(A.Von Gabain)抽出其中一部分资料加以整理,写成《高昌回鹘(850—1250)的生活》一书,现经邹如山同志汉译,由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译室出版。

外国的史学家,其熟悉汉文史料,善于用科学考证方法治西域史或回鹘史者开始于十九世纪末日本藤田丰八与桑原隲藏。降及二十世纪初,日本史学界在其所写有关我国维族史的论文,也大都钻研深入,水平较高:如羽田亨《论九姓回鹘与九姓乌古斯的关系》(《东洋学报》9卷1期)、桑田六郎《回鹘衰亡考》(《东洋学报》1928年17卷1期)、松田寿男《高车独立年代考》(《回教圈》10卷1期)、小野秀美川的《铁勒考》(《东洋史研究》1940年5卷1期)、山田信夫《九姓回鹘可汗的系谱》(《东洋学报》1951年33卷3、4两期)、堀直《十八至二十世纪维吾尔族人口试论》(《史林》1960年4期)、佐口透《塔兰奇人的社会,伊犁河谷维吾尔部落史,1760—1780》(《史学杂志》1973年第1期)、前人《清朝统治下的吐鲁番》(《东洋学报》1979年60卷3、4两期)、森安考夫《关于回鹘的西迁》(《东洋学报》1977年69卷1、2期)、承谷吉郎《甘州回鹘可汗的系谱》(《史观》1978年99卷)、佐口透《撒里维吾尔种族史考》(《山本博士论丛》)、佐腾圭四郎《北宋时期回鹘商人的东渐》(在《星博士退官纪念中国史论集》中)等。

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也先后出现了有关回鹘史的单篇论著,如王国维《九姓回鹘碑跋》(《观堂集林》卷20)、丁骥《新疆住民与维吾尔族》(《民族学研究集刊》5期)、梁园东《回鹘史注释》(《边政公论》2卷)、李符桐的《回鹘西迁以来盛衰考》(《东北集刊》2期)、兰文征的《回鹘与唐之经济关系》(《经世季刊》1卷4期)、姚薇元的《回鹘人华化考》(《文讯》创刊号)、王日蔚《丁零考》(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2期)、《伊斯兰教传入新疆考》(《禹贡》4卷2期)、《葱岭西回鹘考》(《禹贡》4卷5期)、《维吾尔名称变迁考》(《禹贡》7卷4期)、王静如《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辅仁学志》7卷1、2期合刊)、李晋年的《新疆回教考》(《边疆研究季刊》创刊号)、岑仲勉《抄明李英征曲先故事并略释》(《史料与史学》第1本)、周宪